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18年第3期（总第76期）

叙利亚化武危机背后的中东乱局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叙利亚化武危机背后的中东乱局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2018年4月14日,美英法三国在毫无真实证据的情况下对叙利亚展开的残酷轰炸,再次把已经延宕七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拉入了全世界的视线。美英法的霸道行径不仅是西方在21世纪再次上演的“强权即公理”的悲剧,也彻底体现了美国和西方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道德伪善,及其作为全球治理领导者的权威崩塌,而围绕叙利亚危机复杂博弈的长期化也将使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叙利亚也将因更深度地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继续付出更大的代价。

一、叙利亚化武危机的背景、实质及其影响

(一) 叙利亚化武危机的背景

第一,叙利亚的东古塔战事接近尾声,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对全国主要城市的收复和控制能力在继续增强,叙利亚战局的变化越来越向着有利于巴沙尔政权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叙利亚危机博弈各方在曾经稍微有所淡化的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上的分歧变得更加凸显。

第二,俄罗斯对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主导权不断强化。特朗普上台最初是想重启美俄关系,但是由于国内“通俄门”事件的影响,美俄关系重启不但没有实现,还向着不断恶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进入

2017年以来，俄罗斯联合土耳其、伊朗建立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阿斯塔纳机制。这个机制成为独立于西方主导的日内瓦机制之外的另外一个机制，在实现叙利亚战场停火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这种作用。再加上叙利亚国内的战事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节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不能再任由俄罗斯的主导权继续进一步发展。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近期英俄之间的间谍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国在这次问题上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第三，2017年“伊斯兰国”组织实体基本被剿灭后，反恐共同利益的弱化使各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矛盾再度凸显。2017年“伊斯兰国”组织的实体基本上被消灭，尤其是2017年伊拉克的摩苏尔和叙利亚的拉卡相继被解放，作为实体的“伊斯兰国”基本上已经被剿灭，当然它的外溢和扩散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2015年、2016年曾经凝聚美俄合作的反恐共识在下降，那么争夺叙利亚主导权的问题就进一步凸显。

（二）叙利亚化武危机实质

美俄及其扶植的代理人之间严重对抗，而双方又均无法主导叙利亚危机的现实，是叙利亚危机常态化的根源所在，叙利亚因此成为美俄及其代理人恶斗的棋盘；叙利亚因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并不断上演强权横行、利益交换、生灵涂炭、道义沦丧的国际政治悲剧。

（三）叙利亚化武危机的影响

1、全球治理的困境加剧

从全球治理的层面看，美英法的倒行逆施将继续加剧全球治理的困境，而西方作为全球治理负资产的效应将更加凸显。西方在缺乏联合国授权情况下肆意发动军事干涉，其恶果之一是作为全球治理核心

机制的联合国权威的弱化，战后为西方主导所确立的集体安全机制不断被撕裂，全球安全治理的共识不断弱化乃至丧失殆尽。

在叙利亚危机等中东热点问题上，不仅世界主要大国美俄之间存在严重信任缺失，即使西方内部的裂痕也在加剧；西方也从未成为新干涉主义战争的受益者，作为中东动荡副产品的国际恐怖主义不仅使欧美腹地（纽约、伦敦、巴黎、马德里等）屡次遭受严重恐怖袭击，欧洲至今仍饱受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双重考验。

2、国际体系的新冷战格局更趋固化

从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层面看，美英法轰炸叙利亚既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又一次“群殴”，也必将深化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战略对抗的新冷战格局。从本质上来说，西方轰炸叙利亚是表，削弱和遏制俄罗斯，避免俄主导叙战后重建为实。

因此，西方轰炸叙利亚无疑是近两年来在叙利亚问题上顺风顺水的俄罗斯遭遇的严重挫折。尽管俄在此次事件中保持了高度克制，但这恐怕也是由西方军事打击的有限性和俄无意直接与西方走向直接军事对抗所决定的。倘使西方寻求以军事手段颠覆巴沙尔政权，不断挑战俄在叙利亚的战略底线，俄必将做出强势反击，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新冷战对抗也必将因此趋于固化与强化。

3、加剧地区乱局和叙利亚危机的长期化

西方对叙轰炸无疑会鼓舞“倒巴沙尔阵营”的士气，进而加剧各方围绕叙利亚危机的角逐。例如此前土耳其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向叙利亚发射导弹；西方轰炸叙利亚后沙特、伊拉克拟向叙派兵等。

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的关系来看，西方的军事打击无疑会给濒于失败、四分五裂的反对派注入一支强心剂，进而增加其在政治解决叙利亚谈判过程中的信心和砝码，或坚定其进行负隅顽抗的决心，进而加剧叙利亚危机的长期化。

地区乱局和叙利亚危机的长期化也必将为“伊斯兰国”和“基地”

组织等极端组织所利用，为极端组织的发展或者卷土重来提供温床，这已经成为阿富汗战争以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4、对世界经济及能源市场的冲击总体有限

基于供大于求的供求关系和新能源开发的现实，尽管短期内能源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摆，但 2014 年以来油价低迷的基本态势难有改变。原因：能源价格对中东动荡反应迟钝已经成为近年来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主要产油国的减产协议效果不佳，伊朗等产油国不受限产协议的控制；低油价是美国打击俄罗斯，使俄经济进一步恶化的手段之一；西方经济疲软、页岩油等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新能源革命，改变供求关系格局。

二、外部力量博弈叙利亚的演变

(一)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至 2013 年 8 月化学武器危机爆发

这一时期，外部力量围绕叙利亚的斗争主要表现为支持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两派外部力量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外交博弈，以及西方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恫吓。这是阿盟和英法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对叙利亚进行干涉的时期，也是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外部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土耳其也是叙利亚反对派的重要支持者；美国尽管支持推翻巴沙尔政权，但具有一定的被动性，甚至某种程度上有被阿盟和欧洲绑架的色彩。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于 2011 年 8 月和 10 月、2012 年 1 月和 2 月共 4 次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避免了利比亚模式在叙利亚的复制。期间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对阿盟和西方外部力量加大对叙危机的干预发挥了重要影响，其一是 2011 年 10 月利比亚战争结束助长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在叙复制利比亚模式的欲望；其二是 2012 年 5 月胡拉惨案的发生，促使阿盟和西方以人道主义危机和

“保护的责任”为由推动对叙利亚的干涉。由于在联合国框架内受阻，美国及其西方伙伴和阿盟推出了“叙利亚之友”大会，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对叙利亚反对派进行支持，并于2012年2月和2013年4月在突尼斯和土耳其召开会议，美国呼吁俄罗斯与中国参加会议，但俄中以叙利亚政府未受到邀请而拒绝出席会议。在第二次“叙利亚之友”大会上，美国承诺向叙利亚反对派增加价值约1.23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及非杀伤性武器装备，总额达2.5亿美元。2012年6月，美国联合俄罗斯、联合国和阿盟在日内瓦启动了有关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进程，但叙利亚政府仍被排斥在首次会谈之外。

(二) 2013年8月化学武器危机至2015年9月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

代理人战争和围绕反恐问题的博弈构成了支持叙政府和反对派的两种外部力量斗争的主要内容。2013年8月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由于触碰美国设定的“红线”，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授权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十余个国家支持对叙利亚政权发动军事打击，但最终奥巴马政府接受俄罗斯“化武换和平”计划而告终。叙利亚化武危机和平解决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外部力量放弃以战争的方式干预叙利亚危机，叙危机转向双方各自支持反对派和政府军的代理人战争。美国主要负责对所谓的“温和反对派”提供武器和培训，沙特等地区国家提供资金支持。2014年6月“伊斯兰国”的产生不仅使反恐问题成为叙利亚危机的主要议题，也使叙利亚战场态势向着更加不利于叙利亚政府的方向发展，巴沙尔政权一度濒临岌岌可危的困境。反恐问题也导致外部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形成了美国、俄罗斯、沙特主导的三大反恐联盟，并以反恐为名进行地缘政治博弈。在外交领域的斗争中，叙利亚政府的处境有所改善，2014年1月叙利亚政府代表获准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谈。

(三) 从 2015 年 9 月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到 2017 年 1 月俄土伊阿斯塔纳机制的建立

这一时期是俄通过军事介入扭转叙利亚力量对比,进而推动叙利亚问题重回政治解决轨道的重要时期,也是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外部力量相对上升、支持反对派的外部力量相对下降的时期。2015 年 9 月,普京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出其不意地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展开大规模空袭,推动叙利亚危机进入新阶段,实现了扭转叙利亚战局,推动叙利亚危机重回政治解决、摆脱乌克兰危机压力、俄在战略上重返中东等多重战略目标。

2015 年 10 月底,叙利亚问题有关国家外长会议在维也纳召开,各方达成共识,强调联合国主导叙利亚和平进程,寻求全国范围的停火,进而重启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2015 年 11 月,第二次叙利亚问题外长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围绕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停火止暴、人道救援、反恐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就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路线图达成共识,构成了随后安理会决议的政治基础;

2015 年 12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2254 号决议,就叙利亚政治过渡提出 6 个月内停火并组建联合政府、18 个月内起草新宪法并进行自由选举的“和平路线图”,这也是 2013 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叙利亚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

2016 年 2 月,美国与俄罗斯宣布叙利亚内战停火协议,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表示接受;2016 年 3 月,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同月启动,双方围绕尊重叙利亚领土完整、拒绝外来干预、叙未来由叙利亚人民主导、共同打击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等问题达成共识;

在 2016 年至 2017 年初,叙利亚政府军不仅完成收复阿勒颇、霍

姆斯等重要城市，也收复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大片领土，奠定在叙利亚消灭“伊斯兰国”实体组织的基础。美俄在反恐问题上共识的增加、土耳其在叙利亚政策的转变和俄土从对抗走向接近，是叙利亚问题重回政治轨道的重要原因。

（四）2017年1月俄土伊阿斯塔纳机制建立以来

在这一时期内，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俄罗斯、伊朗等外部力量持续发力，最终建立叙利亚问题日内瓦机制之外的阿斯塔纳机制，并通过建立“冲突降级区”对抑制叙利亚军事冲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影响叙利亚问题的两大外部力量围绕巴沙尔政权和反恐等问题的分歧依然严重。

阿斯塔纳机制：经过2016年底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的酝酿，由三方发起的阿斯塔纳会谈于2017年1月23日举行，其主要目标是在叙利亚战场实现停火和建立停火监督机制。2017年5月4日，第四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签署了“冲突降级区”备忘录，以降低冲突烈度，缓解人道主义危机。这是美俄双方达成的妥协方案，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同意俄罗斯主导“冲突降级区”的工作，加速了叙利亚政府军打击恐怖主义军事行动的胜利。2017年11月22日，俄、土、伊（朗）三国总统在俄南部城市索契举行会谈，就叙利亚问题的最新进展、出路等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并签署联合声明。

日内瓦机制：为推动2015年底达成的叙利亚问题和平路线图，叙利亚问题第四轮会谈于2017年3月举行，就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框架下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设立了政治过渡、修订宪法、举行大选和反恐等主要议题。此后，在多轮日内瓦会谈中，由于双方在巴沙尔总统去留问题和恐怖主义认定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导致会谈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

2017年5月4日，第四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签署了“冲突

降级区”备忘录，以降低冲突烈度，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根据这项备忘录，代表叙利亚政府的俄罗斯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同意建立三个“冲突降级区”，分别位于拉塔基亚、哈马以及阿勒颇等省份，挫败了叙反对派武装与“征服阵线”联合起来对抗叙利亚政权的策略，基本上实现了将“征服阵线”与温和反对派武装分离的目标。埃及和约旦也加入“冲突降级区”担保国行列。

三、域内外力量博弈叙利亚的诉求与政策

（一）美国的叙利亚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战术性政策，而非战略性政策

美国的叙利亚政策从始至终呈现出战略犹豫和战略谨慎的特征，其实质是伴随美国实力衰退，美国领导和控制中东的能力严重下降，尤其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使美国抑制住了通过战争对巴沙尔政权进行更迭的战略冲动。

美国介入叙利亚危机的动因包括民主价值观、反恐、遏制伊朗、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盟友绑架等多种主客观因素，外交和舆论施压、借助地区和西方盟友、经济制裁、低烈度军事打击，以及援助、训练、武装反对派等构成了美国介入叙利亚问题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但美国始终把发动战争更迭叙利亚政权排除在政策选项之外，这是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叙利亚政策的延续性所在。

特朗普执政一年多来，“限穆令”、遏制伊朗并挑拨沙特与伊朗对抗、打击“伊斯兰国”、修补盟友关系并推销军火谋利、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等，构成了特朗普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美国中东政策日益呈现出道义日益缺失、战略性弱化和战术性加强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色彩。叙利亚问题并未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反恐问题和巴沙尔去留成为其主要关切，前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后者。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团队成员多次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的优先性，

暗示巴沙尔政权去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美国对反对派的支持甚至有所下降，包括停止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提供武器和训练的秘密项目。2017年4月和2018年4月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尽管美国对叙利亚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但只是一种战术性的有限打击。

（二）俄罗斯以叙利亚为支点重返中东，其叙利亚政策是一种战略性安排

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从始至终都具有突出的战略性特征，并呈现出从战略局部到战略全局的拓展、从战略游移到战略坚定的强化过程。通过叙利亚政策带动重返中东，摆脱乌克兰危机的战略压力；通过军事行动打击“伊斯兰国”，掌握战略主动权和道义制高点；通过拉住伊朗组建盟友体系，同时发展与土耳其、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国家的关系并分化美国盟友，都具有极强的战略性。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后，俄罗斯便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叙利亚政府给予全方位的支持，维护中东唯一盟友的政权安全、捍卫俄在叙利亚海军基地塔尔图斯港的现实利益、防范伊斯兰极端势力渗透是其主要考虑，但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前俄对叙战略尚有一定的保留，舆论也一直有俄罗斯是否会抛弃巴沙尔政权的猜测。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化解后，美不愿发动战争的意图明确化，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利用叙利亚与西方博弈的战略需求强化，而同年“伊斯兰国”的崛起和扩张和叙战场形势日益对巴沙尔政权不利，这一系列因素促使俄于2015年9月军事介入叙利亚，并且具有张弛有度的特点，既通过“以打促谈”促使叙利亚危机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又通过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实效彰显了道义，进而战略和道义层面取得巨大的双重收益。

俄还利用2016年土耳其政变、美土矛盾加剧等机遇成功使土耳其

的叙利亚政策软化，并通过发展与沙特、埃及、以色列等美国盟友的关系扩大在中东的存在，分化美国的盟友体系，同时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反恐合作，进而弱化了反对叙利亚政府外部力量的统一阵线。

2017年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在军事和外交领域收获颇丰。在军事领域，俄助力巴沙尔政权收复失地，解放被反对派和极端组织控制的大片领土，彻底扭转叙利亚的战场态势，并不失时机地于2017年11月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向国际社会释放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信号，同时向美国施加压力。在外交领域，俄罗斯于2017年1月建立俄土伊主导的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机制，成功在叙利亚建立“冲突降级区”，既实现了推动叙战场停止冲突的外交成绩，也在战场有效剥离了极端组织“支持阵线”和叙利亚反对派。

俄罗斯尽管在叙利亚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也深知叙利亚问题复杂性和其国内经济困难等因素的制约。这也是俄罗斯对西方轰炸叙利亚保持克制的原因。

（三）土耳其叙利亚政策的变化最具戏剧性，但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最初动因：加入欧盟受挫，外交重返中东，增强地区影响力；影响地区转型国家发展方向，推广“土耳其模式”

主要方式：支持反对派，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为反对派提供平台；对极端组织IS态度暧昧，纵容其消耗巴沙尔政权；与支持巴沙尔政权的俄罗斯发生摩擦，2015年底击落俄战机事件。

变化及原因：2016年7月政变后改善俄土关系、2017年1月加入俄主导的阿斯塔纳机制为重要标志。原因：国内政治需要；叙利亚库尔德势力的不断重大；难民问题的压力；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恐事件；美土和美欧关系龃龉不断（居伦运动）。

土耳其叙利亚政策演变：

第一阶段为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至2016年7月土耳其未

遂军事政变之前，其政策核心是全面支持叙反对派，并不惜与俄罗斯对抗。其主要方式包括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为反对派提供组织平台和国外活动的大本营；扶植和支持叙利亚国内反对派，并提供各种支持；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态度暧昧，纵容其消耗巴沙尔政权；支持同属突厥人的叙利亚土库曼人反对派力量；不惜与支持巴沙尔政权的俄罗斯发生摩擦，于2015年底发生击落俄战机事件。该阶段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激进政策，其主要动因在于在加入欧盟受挫的背景下，在外交上利用“阿拉伯之春”重返中东，力图通过影响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推广正义与发展党的“新土耳其模式”，增强地区影响力，谋取中东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第二阶段为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以来。重要变化是从坚决反对俄罗斯转向积极改善俄土关系，并于2017年1月加入俄主导的阿斯塔纳机制，达成设立了四个“冲突降级区”的协议，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国还多次表达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推动叙利亚停火和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意愿。2017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三次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访问了土耳其，两国总统一年举行四次会谈，重点讨论叙利亚局势、改善并重整双边关系。尽管土仍未放弃巴沙尔必须下台的政策，但由于叙利亚库尔德势力不断坐大，难民问题压力倍增，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恐事件，美土和美欧关系龃龉不断，土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不断走近。相反，土耳其与美欧在“居伦运动”、库尔德问题、难民问题等问题上的矛盾，都使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呈现出不断恶化的态势。

2018年1月20日至3月18日，土耳其跨境对叙利亚阿夫林区实施了近两个月的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旨在清除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并通过后续行动在土叙边界沿线建立“安全区”。

从短期目标看，土耳其旨在驱逐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武装“人民

保护部队”，并把该地区控制权转交土耳其扶植的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控制从阿夫林至幼发拉底河岸的广阔区域，遏制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更进一步讲，土耳其的目标是沿着 900 公里长的土叙边界在叙北建立纵深 30 公里的“安全区”，并将大量滞留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阿拉伯难民迁移至“安全区”内，实现支持自身扶植的“叙利亚自由军”，通过改变叙北人口结构割裂库尔德人控制区域，通过建立土叙边界隔离区斩断两国库尔德力量的联系，进而维护土耳其南部安全等多重目标。

目前来看，土耳其将进一步通过军事行动打通叙北部所谓“安全区”，埃尔多安于 3 月 25 日宣布近期将继续东进攻打叙利亚城镇。“安全区”的扩大将使叙北部地区人口地区分布更加复杂，加剧阿拉伯民族与库尔德人的矛盾，进而加剧叙利亚的碎片化，并有可能使“伊斯兰国”残余力量获得发展空间。

（四）沙特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既定政策仍未改变，虽实现无望，但仍是叙问题政治解决的重要破坏者和搅局者

动因：意识形态——泛伊斯兰主义与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之争，通过推翻巴沙尔政权彻底清除其意识形态挑战，确定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教派矛盾：削弱乃至肢解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地带”。

介入手段：为叙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活动平台；支持叙极端组织消耗巴沙尔政权；在叙利亚和平进程谈判中顽固建设巴沙尔必须下台，为叙和平进程设置障碍。在 2017 年 12 月的第八轮日内瓦和谈中，在反对派“叙利亚谈判委员会”中，据说受到沙特支持、态度强硬的利雅得派在 36 人的代表团中占据 28 席，他们的“倒巴沙尔”立场令叙政府代表团推迟参会，甚至一度返回大马士革。

目前态势：除继续坚持巴沙尔下台，在谈判中支持叙反对派外并

无更多手段。但在美国轰炸叙利亚的影响下，沙特称将向叙利亚派出由沙特领导的伊斯兰国家多国部队。油价长期低迷导致的财政困难，国内改革压力，在也门、卡塔尔等多线与伊朗角力等问题都对其叙利亚政策构成掣肘。

（五）伊朗支持巴沙尔政权的政策不会改变，但内外制约因素增多

动因：伊朗的叙利亚政策既有维护伊朗现实利益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是什叶派与逊尼派复杂博弈的反映。具体原因包括维护“什叶派新月地带”；通过叙利亚问题增强对黎巴嫩真主党等力量的领导和控制；自身安全和抗衡沙特、美国的需要等。

伊朗和叙利亚关系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伊朗和叙利亚尚处于对抗状态。在 1968 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关系恶化和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一定改善。

上世纪 70 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共同反对以色列的目标使伊朗和叙利亚合作的政治基础得以加强，而 80 年代的两伊战争和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使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正式形成，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采取了支持伊朗，反对同属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的政治立场，同时允许伊朗革命卫队在 1982 年黎以战争中进入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训练真主党武装，共同抗击以色列。

上世纪 90 年代海湾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关系一度因叙利亚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而疏远。2000 年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叙利亚国力持续衰落，尤其是在黎巴嫩问题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孤立，使叙利亚对伊朗的需求不断扩大；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和伊朗安全环境恶化，并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的下一个目标之际，伊朗和叙利亚同盟关系再度得到加强，其突出标志是双方于 2004 年签署的战

略合作协定。

从本质上来说，伊叙战略同盟“是一个缺乏意识形态基础的实用主义联盟”，叙利亚复兴党世俗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奉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并不相同。因此，从双边的角度看，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伊朗既没有向叙利亚输出革命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诉求，叙利亚也无效仿伊朗神权模式的动机。但从伊朗对外战略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角度看，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中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

尽管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性质不同，但叙利亚的掌权者为什叶派阿拉维派，两国均与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存在矛盾，因此伊叙同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伊朗抗衡沙特主导的逊尼派阵营，这也是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的原因之一。伊朗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提供全方位支持，即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大力支持。

（六）以色列的叙利亚政策相对低调，重要关切在于安全问题，尤其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势力在其周边的扩张，近期政策渐趋激进。

以色列当然是美国阵营内的核心成员，但其中东变局中的政策总体低调，而近期政策渐趋激进，主要原因在于宿敌伊朗地区影响尤其是在叙利亚的势力不断扩大，迫使其不断与沙特走近，双方的合作大有从秘密走向公开之势，同时其在叙利亚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的对抗更趋强化，使其成为此次导弹袭击叙利亚的最大嫌疑人。从未来态势看，以色列加大对叙局势介入的趋势有可能进一步增强。

四、当前叙利亚危机的态势与前景

第一，围绕叙问题的战略博弈进入混沌期，突出表现在美俄既对

抗又合作的复杂态势，有俄罗斯专家称其为“混合冷战”，双方对叙政权问题分歧严重，但在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反恐问题上又保持合作。

第二，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外交斗争进入了复杂相持期，政治解决成为主要方向，但围绕巴沙尔政权去留和恐怖组织界定等问题的分歧严重。

第三，围绕叙利亚问题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支持叙政府力量的方向发展，但两个阵营都在总体上都呈内部分化复杂化的态势。

第四，直接的军事较量有所下降，但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低烈度冲突将长期化，如近期无人机对俄军事基地的轰炸，以色列对叙发动军事打击等，土耳其对阿夫林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动的军事打击，西方近期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等。

第五，国内因素对各大外部力量叙利亚政策的掣肘加大，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等都是如此。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叙利亚危机或将进入政治解决艰难和低烈度冲突并存的僵持期。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
